

我们这一代

张稚丹

自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组织文人编纂《文选》始，几乎各朝代都有自己的文选，如唐代的《群书治要》、宋代的《文苑英华》等，借此倡导自己的价值取向和审美偏好。

流行广泛的《古文观止》编成于清康熙三十四年（1695），为学童启蒙之用，所选文章到明代止；《古文辞类纂》成于乾隆四十四年（1779），选文以唐宋八大家为主，距离现在最近的一部《经史百家杂钞》成于咸丰十年（1860），所选文章多为宋前的，明代后只有两篇清人文章，到今天也有150多年了。一个半世纪过去，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，需要新的文选育人资政，给后人留下一份具有当代性的文化遗产。

2015年2月，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参事、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座谈会上提出“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情”，倡议用“百篇”的形式编纂一部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文选，以传承文化经典，展现传统文化在当代的意义，为构建民族精神家园助力。

中央文史研究馆、国务院参事室汇集强大研究力量，确定体例，精选精编、九审三校，《中华传统文化经典百篇》于今年10月由中华书局出版，旋即获得社会各界的关注与好评。

中华传统文化浩如烟海，其经典名篇也是灿若群星，数不胜数。《昭明文选》的标准是“事出于沉思，义归乎翰藻”，即情义与辞采兼具，一般不收经、史、子。那么，《中华传统文化经典百篇》又以什么为标准选择篇目呢？

在近日召开的《中华传统文化经典百篇》出版座谈会上，该书主编、北京大学国学院院长、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袁行霈介绍说，该书的读者对象首先是公务员和领导干部。书分上下两册，所选作品包括先秦至近代的诗歌、辞赋、语录、史传、奏议杂记、序跋、尺牍等各种文体，尤其注重关乎修身立德、治国理政、伸张大义、嫉恶刺邪、亲情伦理的传世佳作，可谓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较小体量的缩影。每篇文章都做了题解、注释和解析，以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，与当代文化相适应，与现代社会相协调，创造性转化，创新性发展，激活其生命力，让人常读常新，百读不厌。



不久前，“四大名著”是否适合青少年阅读的话题，引发社会讨论。事实上，关于名著的讨论由来已久。很多问题都绕不开的一个问题是：怎样的作品可以称为名著？就此问题，本报采访了多位专家。

读者群相对广大

小酌时有感而发：“举杯邀明月，对影成三人”；身处异乡不禁感慨：“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”；即使不是文学爱好者，也可能脱口说出“生存还是死亡，这是个问题”这句莎士比亚戏剧《哈姆雷特》里的经典对白。

这些作品凭借巨大的读者群，成为公认的名著。美国教育家莫提默·J.艾德勒在《如何阅读一本书》中指出，名著的读者最多，名著靠时间积累起了大量读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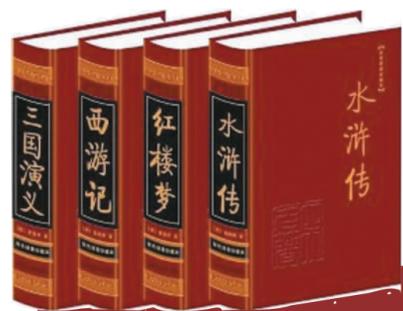
以“四大名著”为例，它们普及程度高、读者群体广大。中国版本图书馆近日公布的一组数据显示，根据2013年至2016年8月CIP数据统计，重复出版排



“今天如何读名著”系列之二

什么样的作品能称为名著？

李泽岩 潘旭涛



名前10位的均是名著。其中，《西游记》出版525种、《红楼梦》出版492种、《水浒传》出版485种、《三国演义》出版484种。

再以作家路遥的长篇小说《平凡的世界》为例，根据出版社的数据显示，到2015年9月《平凡的世界》累计销售至少300万套。

有启发性影响力

“一部文学作品能否被称为名著，还在于它是不是真实地反映了社会现实和社会问题，人们是否能从文学作品中观照社会和历史，然后进行思考。”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党圣元向本报表示，著作要成为名著，就应该有原创性，并且要能达到一定的思想深度，进而启发读者进行思考。

莫提默·J.艾德勒也认为，名著最有影响力，因为名著最有启发教益，含有独特的见解，是言前人所未言，道前人所未道。

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·马尔克斯的《百年孤独》，在文学创作上给人诸多启示。中国作家莫言坦承，他的文学创作受到过马尔克斯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启示。而马尔克斯自己也承认，他的创作也受到卡夫卡《变形记》的启示。

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程光炜向本报表示，文学名著可以分为文学经典和文学史经典；前者艺术生命力很长，而后者相对来说可能艺术性稍弱，但是在

文学史上影响力很大，特别是在历史转折时期。比如，刘心武1977年发表的小说《班主任》，开伤痕文学先河，具有较大影响。

当然，名著并非专指文学作品。党圣元表示，其他一些理论性、研究性的作品要想成为名著，应该能以思想性和原创性推动所在学科领域的发展。

时间上有延续性

“尽管不同的读者、不同时期的读者对名著的判断标准有所差别，但是名著应该存在共同性的东西。莫言的作品、贾平凹的作品现在也还在被人研究，过了二三十年了，这些作品仍然没有过时。”程光炜说。

名著在时间上往往有延续性，很多作品流传几十年、几百年甚至上千年。

《孙子兵法》成书于约2500年前。军事科学院研究员钟少异认为，孙子战略思维的一些基本取向，如“重根本”“贵有备”“求全胜”等，对于妥善应对国家安全的长期复杂态势具有借鉴价值。意大利埃尼公司总裁贝尔纳贝评价《孙子兵法》，认为这是一本关于战略的全面的教科书，今天仍能运用到人类的各种活动中去。

党圣元表示，一个学科、一个研究领域的发展历程就是由一部部名著、一篇篇名作构成的。中国几千年的文学史之所以这么丰富、灿烂，就是因为每个阶段、每个时代都有高水平的名著出现。“名著在艺术和思想上的成就虽然属于它的诞生时期，但是名著也可能超越历史、超越时间空间，在诞生几千年之后仍能

给人新的启发，能被不断解读。而畅销书就不同，很可能一段时间之后就会销声匿迹。”

谈及畅销书，党圣元认为，在读者群是否广大这方面，畅销书与名著也是有区别的。党圣元表示，畅销书可以在一个时段之内积聚起不少读者，而名著在一定时间段之内很可能不是畅销的。

艾德勒在《如何阅读一本书》中也提到这一点，他认为名著的读者是通过时间汇聚起来的，而不是一时的，名著不是一两年之内的畅销书，而是经久不衰的。

党圣元认为，与畅销书不同，名著也有可能诞生时期没有受到重视，经过一段时期才能被人重新发现、解读。东晋时期陶渊明的山水诗就是在唐朝王维、孟浩然等人的山水诗兴起之后才被人重新发现的。



《百年孤独》企鹅版



“大学”“中庸”浸润社会价值观

刘英团

《大学》和《中庸》，原为《礼记》中的两篇。南宋朱熹把《大学》《中庸》与《论语》《孟子》编在一起，称为“四书”，供读书人阅读。朱熹还撰写《四书章句集注》以解释“四书”的文字和义理。朱熹曾说：“我平生精力，尽在此书，先须通此书，方可读他书。”在《四书》体系之中，朱熹认为《大学》是《四书》之首，既可引导初学者以正学之径，又值得学者终身玩味其义理。朱熹也极为推崇《中庸》，“其味无穷，皆实学也。善读者玩索而有得焉，则终身用之，有不能尽者矣。”

张葆全的《大学中庸译解》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），与坊间流传的同类书籍大不同。他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研究，学术研究集成了“诗话词话研究”“文选研究”“玉台新咏研究”“先秦诸子研究”“传统文化研究”五大板块的学术系列著作。其中，《大学中庸译解》不但集合从教60余年的教育实践、人生体验以及当今社会现实，融古通今，深入浅出地讲述为学修身、为人处世的道理，还据原文和朱熹解说（《四书章句集注》）为各章加了标题。张师“译解法”不但条理清晰地再现了经典风貌，信手翻阅一章也可顺畅地诵读，而丝毫不显突兀。每章之后，张葆全特摘录重要语句以方便熟读背诵，“读中庸大学，每早起须诵十遍”。朱熹说：“读书须成诵方精熟。”

“基本的社会价值观”是社会构成的骨架。如果“骨架”散了，则“社会”就崩溃了。《大学》和《中庸》是儒家的两部重要经典，堪称“儒家思想（或精神）的集大成者”。宋代大儒张载说过，学人要“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”。张葆全的《大学中庸译解》不但回溯孔孟原典，还提出了不少新观点、新思想，是对“大学”和“中庸”学的新发展。如果说《大学》沉淀了我们的内心，那么《中庸》则进一步提升了我们的境界。“中”是原则，“庸”是实践，中庸就是知与行的统一。其中，张葆全对《大学》《中庸》具体思想的内涵、概念的转换和内容的阐述，对朱熹如何通过经学阐发理学的概念和思想的译解，不但实现了从经学向理学的过渡，还精准凝练地传承与弘扬了优秀的传统文化，更丰富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。而有了这一“主心骨”，整个社会一定会更和谐、更稳定。

朱熹曾言：“《大学》是个大坏模。《大学》譬如买田契，《论语》如田亩阔狭去处，逐段子耕将去。”张葆全也在课堂上对众生言道，《大学》《中庸》是“修身治人底规模。如人起屋相似，须先打个地盘。地盘既成，则可举而行之矣。”

其实，无论是比作“地盘”，抑或“坏模”，《大学》《中庸》不但承载了修身治国的根本之道，还确立了修学进德的正确导向。当代学者在学术成就和思想深度上胜过张葆全的可能不乏其人，但很少有人能把“大学”“中庸”之精要以生动自然的语言融汇贯通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体系中。在这一方面，张葆全对《大学》《中庸》的译解是难以替代的。



顾炎武的另类读书法

唐宝民

顾炎武从年轻时起，就有志于学问，想成为一个学术大家，所以，特别重视读书、学习，每年都要利用春夏时间温习经史。

在乡间做教师工作时，他不是一个人读书，而是请4个声音洪亮的朋友来一起读。在每个人面前，都放置了经史书的注释本，顾炎武坐在中间。开始学习了，顾炎武让一个人先大声诵读，其余4个人静静地听。在读的过程中，如果某个人对所读的内容有疑义，就打断读书人，提出自己的疑义，于是，大家就开始讨论这个问题，互相辨析、争论，直到意见统一了（当然，也有可能没能统一，就各自保留自己的观点），再接着往下读。读着读着，又有人对其中的内容提出疑义了，就再停下来讨论……这样一篇篇地读下来，等全部读完的时候，基本上就能把疑问都解决了。一个人读20页，就另换一个人读，周而复始，一天能温习100页书。《十三经》读完了以后，接着又读“三史”“南史”“北史”等书，5个人收获都非常大。

这是笔者在《郎潜纪闻四笔》中读到的一则史料，顾炎武的这种另类的读书法，对我们现代人也极有启发意义，这种读书法有三个好处：一是把“看书”变为“听书”，印象更加直观。二是变一人读为多人共读，活跃了读书的气氛。三是一边读一边提出问题、讨论问题，集多人观点于同一问题上，集思广益、群策群力，更有利于理清思路、得出正确的结论。数年后，顾炎武成了一名杰出的思想家，与黄宗羲、王夫之并称为明末清初三“大儒”，被誉为清学“开山始祖”，我想，与他另类的读书方法无无关系。



《唐诗之美日历》封面

出版的就有《唐诗之美日历》《牡丹亭日历》《红楼梦日历》《古都之美日历》等十几种，这些日历符合了读者，特别是年轻读者追求个性化的特点。有业内人士甚至把今年称为日历书元年。

早在上世纪30年代，冯华先生就曾编撰过《故宫日历》，当时被喻为“民国社交的头号礼物”。与那个时代的日历相比，如今的日历更注重审美价值，兼具了颜值高、干货多等优点，符合现代人们对图书实用性、个性化的需求，迎合了时下碎片化的阅读习惯，让人们在忙碌之余能够稍微停顿下来，既受到了文化韵味的熏陶，又获取不少新知，引起了消费者的情感共鸣和价值认同，市场形势火爆也就不难理解了。

精美化、艺术化、主题化、个性化，是这些各类爆款日历书的共同特征。为了“美美”而动员人们“买买买”，设计师们不惜增加成本，千方百计地去找挖掘那些适宜日历表现的主题内容。

“90后”姑娘小白从去年起，连续两年购买了果壳网推出的《物种日历》。她说，其实自己以前并没有使用日历的习惯，“时间用手机看看就OK了嘛”，而之所以会买这套日历，是觉得“有用”：“我们这

Advertisement for '愿高颜值日历书 更平价' (Wish for high-value calendar books, more affordable) by 袁浩 (Yuan Hao). It features images of various calendar books and a price tag.

些从小在城市里面长大的孩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，走在路上连身边的植物是什么都不认识。这本日历通过线上线下的模式，把科普做了出来，让我们知道科学在各个角落里。”当然，也有不少指出，时下市场上广受关注的日历书，大多价格不菲，动辄几十上百，这对工薪阶层来讲有点贵了。这其实也给广大出版商提了个醒——日历书的市场未来走向如何，一方面看的是出版机构能否找到自己的风格，使大家觉得值得去买，另一方面看的是日历书在价格上能否更平价一些，让更多的人能买得起。

Advertisement for '四月六日' (April 6th) calendar page, featuring a bird illustration and text about the date.

Advertisement for '古都之美日历' (Calendar of the Beauty of Ancient Capitals) for August 19th, featuring a bowl of food and text about the date.